

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

《孟子》选评

徐洪兴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YZLI0890124799

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

《孟子》选评

徐洪兴 撰



YZLI0890124799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孟子》选评/徐洪兴撰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11.12

(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)

ISBN 978 - 7 - 5325 - 5962 - 6

I. ①孟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《孟子》—注释
IV. ①B222.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25142 号

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

《孟子》选评

徐洪兴 撰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(1)网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网网址:www.ewen.cc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 × 965 1/16 印张 17.25 插页 1 字数 199,000

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4,3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5962 - 6

B · 737 定价:29.0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导 言

任何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，都有各自的经典体系。通过这些经典体系，我们就有可能了解这些民族的过去。如通过《奥义书》和《吠陀》去了解古印度民族，通过《荷马史诗》、《理想国》、《形而上学》去了解古希腊民族，通过《圣经》去了解古希伯莱民族及后来的基督徒，通过《古兰经》去了解阿拉伯民族。同样，通过我国先秦的经典，可以去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。

但是，经典作为一个民族原创性精神体现的文本，其意义并不仅限于了解过去。借用接受美学的观点，经典具有广阔的不确定域。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，人们知识结构的不同，所需解决问题的不同，经典的意义不断地被历代阅读者所发掘、重建和阐扬。这一点，无论中西，概莫能外。

今天，人类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那些经典是否还有意义？答案无疑是肯定的。世界近现代的历史已经昭示，无论西方还是东方，历史传统的反思与当下意识的追寻，是一个民族建设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支点。就前者言，人们总是通过对其前人所创造的价值观念、行为准则、思想理论和知识系统的理解和解释，建立起自己与文化传统的意义联系；同时又在理解和解释中，使文化传统获得进入现时代的途径和继续发展的契机。所谓的途径和契机，并不意味着完全照搬照抄，而是提供借鉴，展现理据，启示方向。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经典总是常读常新的。

那么，就让我们来读读作为中国传统经典之一的《孟子》吧。

在旧时的中国，孟子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这里我们先来讲讲孟子这个人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为孟子作了篇小传，共一百三十七字，原文如下：

孟轲，驺人也。受业子思之门人。道既通，游事齐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适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。当是之时，秦用商君，富国强兵；楚、魏用吴起，战胜弱敌；齐威王、宣王用孙子、田忌之徒，而诸侯东面朝齐。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

司马迁的介绍过于简洁了点，我根据历代学者的研究稍加展开一下。

孟子名轲，生活在动荡纷乱的战国时代，邹（今山东邹县）人。他的生卒之年，历来有多种说法。仅其生年之说就有九种之多，然后又因各种推算不同、及对他寿数的说法不同，可衍生出更多关于卒年之说。这里仅取一种相对通行的说法，即孟子生于约公元前372年，卒于约公元前289年。

古人除名之外还有字。孟子的字，《孟子》书中未提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亦无记载，东汉赵岐在注解《孟子》时就更不清楚了，只能说孟子“名轲，字则未闻也”（《孟子题辞》）。但从魏晋开始，突然冒出孟子字“子车”、“子舆”或“子居”等好几种说法，尽管煞有介事，但证据却绝无，恐怕不足凭信。

相传孟子的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，后来家道衰微，从鲁国迁居邹国。孟子幼年丧父，与寡母相依为命。世传孟母“迁地教子”、“断机训子”、“烹豚存教”等故事，虽不一定可靠，却也成为流传千古的美谈。

孟子的师承关系不大清楚。司马迁说他“受业于子思之门人”，但“子思门人”是哪位？缺乏进一步说明。从中唐韩愈开始，不少儒者都说孟子的老师是子思，子思的老师是曾参，此说后来流传甚广，但也无确切

证据,所以也有学者并不认可。孟子自己曾说过:“予未得为孔子之徒,予私淑诸人也。”(《离娄下》)这里所“私淑”者是谁?不知道,大概是“子思之门人”吧?而所谓“私淑”,按一般的理解,是指敬仰某人学问但未能登堂入室为其弟子的说法。因此,孟子直接的老师是谁,无法断定。

但有两点似无可怀疑:其一,孟子一生服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,认为“自生民以来,未有盛于孔子也”(《公孙丑上》);并以一生学习孔子为志愿,说“乃所愿,则学孔子也”(同上)。其二,孟子确与战国儒学中子思一派关系颇深。《孟子》书中多次引述子思的言论,也多次引述传为子思老师曾子的言论,可说除孔子外,《孟子》书中引先儒之言以子思、曾子居多;且《孟子》书中有些思想也确与传为子思所作的《中庸》有关,如论“诚”等。与孟子生活时间相近的荀子,在其论衡诸家之学时,明确把子思与孟子作为一派并提,所谓“子思唱之,孟轲和之”(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),荀子是战国儒家的殿军,应对思孟间的关联比较清楚。所以说孟子是子思思想的传人,虽不中,不远矣。

孟子的生平经历,与其崇敬的孔子有颇多相似之处,这主要表现在:

一、与孔子一样,他也长期开门授徒,即使在游历诸国时,学生们还是伴随左右。孟子说过:“君子有三乐,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父母俱存,兄弟无故,一乐也;仰不愧于天,俯不忤于人,二乐也;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,三乐也。君子有三乐,而王天下不与存焉!”(《尽心上》)孟子强调从事教育的快乐,并把教育看得比王天下还要有价值,可见他确实在教学活动中获得过很大慰藉。由于长期从事教育,孟子的学生尽管没有孔子“弟子三千,贤人七十”那么多,但可以想见也一定不少。如他在游历齐国时,已经是“后车数十乘,从者数百人”(《滕文公下》),这所“从”的“数百人”,都是他的学生。只是由于没有类似司马迁为孔子学生专作的《仲尼弟子列传》这种比较可信的资料,所以我们对孟子学生的情况了解不多。现在能确定的也仅有十几人,他们都见诸《孟子》书中。

二、与孔子一样,孟子也有强烈的从政愿望,希望把自己的政治理

想付诸实践。因此中年开始，他也周游列国，从事政治活动，前后达二十多年。关于孟子的游历，向来说法不同，学者的考证更不少，然言人人殊，莫衷一是。这里就笼统叙述一下：孟子是四十来岁开始其政治游历的，曾到过齐、宋、薛、鲁、滕、梁(魏)等国，其间还曾返回邹国。孟子在各国的时间有长有短，有的仅是路过，有的去过数次，旅居时间也较长。其中，去过次数最多、旅居时间最长的是齐国。至于孟子游历诸国时所提的政治主张，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，那就是主张“王道”、反对“霸道”，反复申论“仁政”的重要性、必要性和可行性。孟子要比孔子来得幸运，当时普遍流行“礼贤下士”之风，因此他颇受各国君主优礼。在游说时，孟子常慷慨陈词，咄咄逼人，摆出一付“说大人则藐之”的架式，经常弄得那些国君狼狈不堪，只能“顾左右而言他”。但当时的君主都是一些讲究实际功利的人，他们崇尚的是霸道，大国热衷于攻伐兼并，小国则关心在夹缝中搞平衡、求生存。因此，孟子那些陈意甚高的政治理想，在这些国君眼里就不能不“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”，结果也只能和孔子一样到处碰壁。

三、与孔子一样，孟子晚年也退居故里，以讲学终老。经过多年“仆仆于道路”的东奔西走、四面碰壁后，孟子最终明白了，那些诸侯们虽然在“重士”的风气下对自己很客气，但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自己的政治主张，他的“王道”、“仁政”理想是难以实现了。到了这种境地，他又一次以孔子为榜样，放弃从政愿望，也放弃了齐宣王开出的优厚待遇，回到家乡，与弟子们一起讲学论道，著书立说，希望通过这种形式，把自己的思想传诸后世。于是，也就有了我们今天还能读到的《孟子》。

下面讲讲《孟子》这部书，它可说是旧时读书人自幼起就必读的书。

有关《孟子》的作者、篇数，历史上也有不同意见。关于作者，按司马迁的说法，主要是由孟子自著，而其弟子万章、公孙丑等参与其事；按赵岐、朱熹、焦循等的观点，认为是孟子自著；而韩愈、苏辙、晁公武等的意见，则认为是弟子万章、公孙丑之徒的追记。就目前学术界的看法，

较多是采取司马迁的说法。至于篇数，司马迁说“作《孟子》七篇”，可《汉书·艺文志》却著录“《孟子》十一篇”。《孟子章句》的作者赵岐，分《孟子》为“内书”七篇，“外书”四篇，并提出：《性善辨》、《文说》、《孝经》、《为政》四篇“外书”，“文不能宏深，不与内篇相似，似非《孟子》本真，后世依放而託也。”所以他不予作注。以后这四篇《外书》亡佚了。今存的《外书》，学界公认是明代人的伪作。今本《孟子》共七篇，篇目依次是：梁惠王、公孙丑、滕文公、离娄、万章、告子、尽心。每篇各分上下，共261章（有本分为260章）。篇名取自每篇首章中的几个字，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。

至于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演变，那有一个颇为漫长的历史过程：

秦汉以降至两宋以前，孟子地位一直不高。其人只被视为一般的儒家学者，其书只能归入“子部”一类。在官私文献中，多是“周孔”或“孔颜”并提，鲜见有“孔孟”合称的。当时还有人批评孟子，最典型的是东汉王充，他在《论衡》中专立了《刺孟》一篇，列举了八个方面加以批评。到唐初，争论国子学当祭“周孔”还是“孔颜”时，唐太宗时增加从左丘明到范宁二十二位儒者从祀孔庙时，唐玄宗封颜渊为“亚圣”和“兗国公”、封“孔门十哲”和“七十子”为侯伯时，都只字未提孟子。而当时科举考试的“明经”科目中也没有《孟子》。但从中唐起，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。孟子其名被厕于孔子之后，成为仅次于孔子的“贤人”；其人被政府封了爵号，从祀孔庙；其书被增入儒经之列，悬为科举功令，不久又超越“五经”而跻身“四书”，变成中国士人必读的官方教科书。这个变化过程，就是历史上的“孟子升格运动”。到宋宁宗嘉定五年（1212），国子司业刘焯奏准将朱熹的《论语孟子集注》作为官方之学。差不多同时，目录学家陈振孙撰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，正式从目录学上把《孟子》由“子部”升格至“经部”，成为传世“十三经”的最后一部儒家经典。到元朝至顺元年（1330）元文宗加封孟子为“亚圣公”，这成为整个孟子升格运动的句号。（有关这个过程的具体情况，可参看拙作《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3年第5期。）

唐宋间的这场孟子升格运动，从本质上看，是适应当时中国统治思想转型的需要而产生的，是中国中古时代思想整合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唐宋间思想家之所以这么重视孟子其人其书，是因为孟子的思想中有他们需要的内容，即孟子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特点，与当时思想家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。这些特点包括了道统论、辟异端、谈心性、辨王霸诸方面，此不具论。

当然，孟子升格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其间出现过不少逆向的言行，即删孟、议孟、疑孟、辩孟、黜孟乃至诋孟的思想倾向。但因不合时代潮流，所以没能产生真正的效果。倒是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曾掀起过一点反孟的小浪。作为绝对专制独裁的君主，朱元璋对孟子“民贵君轻”的思想很反感。开始他想罢去孟子在孔庙配享的资格，后在大臣冒死进谏下只能作罢，但却下令删除《孟子》书中“激进”的话共八十五条，出版了一本名为《孟子节文》的书，规定科举考试不能出现已被删掉的文字。尽管如此，权倾一时的皇帝也不能改变已深入人心的文化传统。所以，“怪胎”式的《孟子节文》并没有流传开来。

作为儒家学派重要经典之一的《孟子》，其中包含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，因此历来受到重视，研究者代不乏人，两宋以后尤多专家。这里仅介绍四部最有影响的《孟子》注释作品：一、东汉赵岐的《孟子章句》；二、南宋朱熹的《孟子集注》；三、清代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；四、今人杨伯峻的《孟子译注》。读者如想深入了解《孟子》，这四本书还是要认真看的。

顺便也提一笔，《孟子》文章流畅犀利、气势磅礴，与恢恠憭怪、汪洋恣肆的《庄子》，被公认为先秦散文之双璧，对后世影响极大，从西汉司马迁到唐宋八大家，都从《孟子》中汲取过养分。其次，孟子“好辩”，尽管他自云“不得已”，但无论从逻辑推论、语言技巧、判断能力、应变策略诸方面来看，他都称得上是个雄辩家。所以，也建议热爱古典文学的人、对辩论感兴趣的人，不妨多读读《孟子》。

本书将《孟子》原文经选择后重新分类编排，成五篇十五节，分别

介绍孟子关于心性、伦理、学问、人格、政治五个方面的思想主张，注释力求简明，一般不引书证，凡遇异说，择善而从。

古人有云，“选家最难”，因为牵涉到选什么、如何选及选多少等一系列问题。因此可以肯定的是，本书的选文、分类和结构，难免会造成对《孟子》全书内容的机械划分乃至阉割，不无“虽欲启学，实芜正典”之嫌，这里谨向孟子和读者致歉。至于选文前的“解题”性文字与选文后的“讲评”性文字，除了对选文的略解和一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知识的介绍外，还有不少是结合现实的随感，一得之言，姑妄读之可矣。如果它们或能激发读者诸君的些许思考，对我而言就已经很满足了。

最后我要感谢古籍出版社邀我来做这一题目。我虽曾做过《孟子》全书的解读（《孟子直解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），但因题材样式、行文风格、读者对象等的不同，要做这么一个“选评”也非一蹴而就，再加教研紧张、琐务不断等原因，稿子一拖再拖。幸亏吕健先生既耐心而又坚持不懈的关心和催稿，博士研究生马颢同学又协助我完成了不少前期工作，否则交稿的时间可能会延宕更久。因此，这里也应该向他们两位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目 录

出版说明·····	1
导 言·····	1
一、心性篇——天生我材·····	1
赤子之心·····	4
反身而诚·····	21
事天立命·····	31
二、伦理篇——得其所哉·····	43
父子有亲·····	45
君臣有义·····	61
执中行权·····	80
三、学问篇——道不远人·····	97
求其放心·····	99
深造自得·····	110
知人论世·····	123
四、人格篇——曾经沧海·····	141

何必曰利	143
浩然之气	163
圣人之徒	174
五、政治篇——王道仁政	203
保民而王	205
制民之产	229
仁者无敌	241

一、心性篇——天生我材

本章标题“天生我材”，语出李白《将进酒》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诗人在失意之余仍不忘洒脱，真也浪漫得可爱，不愧为诗中之“仙”。这里我就借这四个字来谈孟子的人性论。

孟子的人性论——一言以蔽之——人性本善。他曾以齐都临淄城南牛山来喻人性：牛山的树木原来很茂盛，因它地处大国都城之郊，人们常用斧子去砍伐，还能茂盛么？虽日夜生息，雨露滋润，但新枝嫩芽一生出来，又被牧放着的牛羊吃掉，所以才变得这样光秃秃。你看这光秃秃的牛山，就说它不曾有过好树木，难道这是牛山的本性？所以，人性原本是善的，只是后天环境使人变坏了。

可以讲，“性善”是孟子所有立论的基点，没有这一点，接下去的都无法说了。孟子充满信心地告诉我们人性本善的道理，企图唤醒人的良知，要人们从利欲熏心的状态中走出来，好好地反省一下：自己是不是真诚？是不是快乐？

宋以后的蒙童要读《三字经》。《三字经》劈头就是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这正是孟子的意思，第二句才是孔子的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。看来，孟子的影响似乎比孔子还大了。那个编《三字经》的人，真可算是孟子的“功臣”！

无论如何，这“天生我材”的“善性”总是好的，因为它孕育着生机与希望，虽也有庄子一句“材不材”的调侃，却无法遮盖孟子那阔大的慈悲心怀。佛家有云“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”，又说“一阐提人，皆得

成佛”（“一阐提人”是断绝善根之人），这因果与佛根又何尝不是孟子的心事？所以，不尽是英雄，哲人所见也略同。

本篇分为以下三节：

第一节“赤子之心”，语出《离娄下》。赤子者，婴儿也。刚生下的小孩，皮肤是粉红色的，所以叫赤子。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”，我以为这是理解孟子其人其书的要领之一。孩子要长大，童年而少年而青年而壮年——“既壮周旋杂痴黠，童心来复梦中身”。龚自珍用诗呼唤“童心”，为什么？因为孩童的天真可爱！人总要长大的，怕就怕人长大了，心也跟着变坏了，天生的好东西越来越少，后天的坏东西越来越多，像茅草一样充塞胸中，成了茅坑。一个好娃就这么被糟蹋了！所以，要向往，要呼唤，要“救救孩子”！当然，这个大人的“赤子之心”只是比方，并非真的让大人们都回去吃奶。禅家有三境：“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；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；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。”这个很妙！“不失赤子之心”当是第三境，只是此“山”此“水”已非那“山”那“水”。难则难矣，但是它美。无论古典、今典，只要是美好的，就能叫人心动，让人着迷。庄子很老了，还做梦化作翩翩起舞的蝴蝶——“庄生晓梦迷蝴蝶”。人活着是要有那么点精神，没有精神不就成了行尸走肉？因此孟子说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”，他自己做到没有？读完《孟子》，你大概会明白。

第二节“反身而诚”，语出《尽心上》：“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；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”反躬自问而觉真实无妄，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；照着推己及人的恕道努力去做，求仁的道路没有比这更近的了。不禁想到“狂人”尼采的快乐配方——“一份是，一份否，一条直线，一个目标”，你看到他的认真了么？这就是主题。没有主题的生活是可怕的，因为不会幸福；一个人即使贫穷也能幸福，因为还有良心。许多人不一定认可，但孟子却是那么想的。

第三节“事天立命”，语出《尽心上》。《中庸》开首即说“天命之谓性”，天既能生，那天命就不全是空想，那里还有实在。在孟子，是自觉将心性与天命打成一片，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，则知天矣”，因

而感到心性的充实和人格的光辉。不但知天，还要“事天立命”，事就是对得起，立就是正。“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，殀寿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”你看这“俟”字用得真好，一点也不惶恐，因为“仰不愧于天，俯不忤于人”，凡事凭良心，就对得起老天了。“天人之际”，在孟子看来是简单的。

1. 赤子之心

本节第一段选自《孟子》书中篇幅最长的“齐桓晋文之事”章，此章涉及孟子思想的许多方面，如“保民而王”、“不忍”、“不为与不能”、“推恩”、“恒产与恒心”、“制民之产”、“仁政”措施等等，选文只谈“不忍”。孟子认为只要国君心存不忍就能保民，于是从齐宣王不忍心杀牛这件事下手，对他进行开导。末了但称宣王的行为心理是“仁术”，言下之意，虽然“无伤”，却也够不上什么仁道：对禽兽尚且“见其生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”，那老百姓呢？非要也在大王面前吓得发抖才会于心不忍么？古代国君又称“人牧”，老百姓仿佛牛羊，孟子一语双关，确实厉害。

第二段说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”。孟子提出“四端”说，“不忍人之心”是“四端”之首、代表“仁之端”的“恻隐之心”。这里都是说“心”。在中国古代哲学里，“心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，既是人们思维的器官，又指道德上的善性，在孟子，则统以“良心”或“本心”名之。孟子认为人性本善，理由是人人具有“四端”，就像人有四肢一样，是与生俱来的。“性善”说开了儒家心性论的先河，后人对此颇多论述，有赞成也有反对，但没有人能完全不理会孟子之说。

第三段说孟子和滕世子谈人性本善，开口不离尧舜。世子懵懂，所以再次登门求教。孟子告诉他真理只有一个，不论圣贤还是众人，本性都是一样的，圣贤能够做到的，普通人经过努力也能做到，除此之外别无他理。因此滕国虽小，只要世子能以圣贤为榜样，还是可以把国家治好的。我们知道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，并将它作为“王道仁政”的哲学基础，而《孟子》书中明确提到“性善”，就始于此章。朱熹《集注》云：

“孟子之言性善，始见于此，而详具于《告子》之篇。然默识而旁通之，则七篇之中，无非此理。”章末引《尚书》的那句话很有意思，说如果药不能让人吃得头昏眼花，病就不会好。可见孟子所以“言必称尧舜”，原

因就在于此，不幸言者谆谆，听者藐藐，滕世子已经很不错了。

第四段说“赤子之心”，大旨见篇首说明。

第五段说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”。在孟子看来，人和动物就差那么一点，什么呢？一点良心。圣贤、常人、小人之分，就看他天良所剩几何。

第六段说无论人性物性，顺其自然之理就能推出其本来面目，能做到这一点的是真聪明，否则不过是穿凿附会的小聪明罢了。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事物之理，莫非自然，顺而循之，则为大智；若用小智而凿以自私，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。”

第七段到第十段，是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：

告子用杞柳与栢棬的关系来喻人性与仁义，认为人性是原材料，仁义是加工品。孟子认为他比喻不当，提出在把杞柳加工成栢棬时，究竟是顺着杞柳的本性，还是要伤害杞柳的本性？如果是后者，那就与他“仁义礼智根于心”（《尽心上》）的主张根本相反，所以毫不留情地批评告子是“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”。

告子把人性比作急流，不分东西，哪里有口子就往哪里流，性无所谓善恶，就像水无所谓东西。但他没想到孟子会用“水往低处流”的道理来反驳，孟子认为只有在外力的影响下人才会变坏，但这种改变却不是人的本性使然。

告子说“生之谓性”，“性”就是天生如此，孟子就用“白之谓白”来比“生之谓性”，然后又以“白羽”、“白雪”、“白玉”之“白”问告子是否相同，告子忘了三者间既有共性又有殊性，竟贸然同意，落入孟子的圈套。

孟子批评告子“义外”说。孟、告二子对“义”的理解并不相同。在告子，则事物性质如此而我的认识也如此，那就是“义”，如“彼长而我长之”、“彼白而我白之”，是事实判断，所以是外在的。而孟子理解的“义”是价值判断，所以是内在的。本来两人是各说各的，惟孟子善辩，把话题引向纯讲价值判断而不谈事实判断。告子不明就里地跟着去讲，